

人工智能与民主:迷思与超越^[*]

陈文胜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迅速扩散及其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使它成为当今政治界关注的中心。它的进步不仅预示着计算的新时代,也给人类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民主产生的影响既充满期待,又心存恐惧。人工智能与民主是天然的盟友吗?人工智能会拯救民主还是摧毁民主?作为民主的资源 and 工具,人工智能在政治参与、政治决策、信息供需、公共服务等民主的核心问题上,是给人类带来曙光和福音,还是给民主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和风险?学界围绕上述问题的激烈争论,被视为人工智能和民主的两难选择。面临这种困境,必须审慎地对待实践技术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张力,并寻求超越之道,如从技术设计、法治、伦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和治理,从而更好地进行民主对话,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民主的未来。

[关键词]人工智能;民主;迷思;超越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10.006

人工智能是现代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同时它也是当代世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博尔特(Bolter)指出:“人工智能之所以引人入胜、备受争议,不是因为它的实际成就,而是因为程序背后的隐喻:人类应被视为自然界的数字计算机。”^[1]几乎在所有领域,人工智能都在展现其惊人的进步和逐渐取代人类的能力,其影响正引发人们普遍的期待和担忧。各国政府正在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系统项目和战略。“人工智能已成为政治生活的固有组成部分”,^[2]并且“也开始触及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将塑造和影响民主实践、思想,甚至民主结构”,^[3]即正重构着人类的民主。今天,当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方向和指引时,却对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技术与民主是否互为镜像?人工智能是对民主的威胁,甚至是民主的终结,抑或是民主发展的潜力所在或催化剂?

在数字时代的曙光中,作为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民主最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得到加强,实现重振民主;同样人工智能也可能被滥用,导致民主的恶化。有学者指出,在政治中使用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愿景,而已是一个现实,“在民主中使用人工智能已是不可避免的”。^[4]这种未来主义的理论将

作者简介:陈文胜,法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与网络政治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交媒体时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影响研究”(22BZZ081)的阶段性成果。

推动人工智能成为民主行为体。随着人工智能逐渐进入政治领域,研究人工智能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人们最终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民主是否得到了保障,还是正在人工智能的裹挟下走向对人的操纵?人工智能应该如何设计,以利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来实现民主目的?公开思考人工智能在民主中的应用有助于化解这些疑问。越来越多的文献正探讨如何对人工智能施加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以确保这项技术不会加剧现有的权力不对称或出现新的权力不对称。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面前,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发展的性质迫使研究者对此保持观察力以及有灵活性和批判性的态度。“技术”是技术哲学中一个不平凡的问题。如何审慎地对待实践技术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张力,并寻求超越之道,使人工智能成为改善人类民主进程的现代化的原创性工具,这是一个值得理论界深入探究的问题。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现在,关于新技术的公开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民主的未来都重要”。^[5]鉴于此,本文借鉴民主理论,试图从政治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出发,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民主的不同方面进行批判性讨论,反思人工智能给民主带来的前景和挑战,并提出富有成效的建议,以阐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平、更透明、更负责任的社会,为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些许管窥之见。

一、民主与技术:天然的盟友?

民主与技术统一于政治性与物质性。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温纳(Winner)发表过一篇经典文章(*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该文批判了一种关于技术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普遍但幼稚的观点:技术是中性的,一切取决于使用。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技术是政治性的:首先,技术设备或系统可能是建立权力或权威模式的手段;其次,技术设备或系统与某些权力模式密切相关。^[6]对此,图德拉(Tudela)也指出:“作为权力合理化的有力工具,人工智能必须被人类理解并融入政治。”^[7]事实上,“技术是政治的这一概念并不新鲜,技术一直影响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且“技术本身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并且经常具有超出人类意图和控制范围的普遍的社会影响”。^[8]拉图尔(Latour)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关注技术是如何成为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及承载和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他对技术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工具论或决定论观点,更重视人类事务和民主的物质性,^[9]这使思考人工智能与民主的依存关系更容易。

民主与技术在上是相互建构的。民主影响技术的设计、采纳和使用,而技术反过来又塑造民主的理念、实践和发展方向,二者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动态演进的社会政治生态系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影响技术发展方向、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公众参与与监督、营造创新环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和监管起到了重要引导和制约作用。并且,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多元力量平衡和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有助于确保技术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反之,“现代民主也依赖于物质特征来发挥作用”和“解决合法性问题”。^[10]与所有形式的治理一样,技术作为民主的工具与载体,决定了民主的展开方式。技术解释了公民如何获取信息,从而界定他们的政治参与,并给人们释放时间来参与集体事务。技术渗透到竞选和投票活动之中,技术还塑造了政治家沟通和官僚决策的方式。正可谓“没有合适的技术,现代民主就无法生存”。^[11]

人工智能改变了民主的物质性和实践方式。一些政治理论家将民主视为一种理想或制度框架,而没有考虑其物质性。在民主的实践中,技术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言,“在民主的社会实施过程中,技术中介是而且始终是固有的”。^[12]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可实现的状态。它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市场和竞争、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不断实现。因此,人们可以

将某些技术使用的物质实践与特定的民主理念、过程和结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为政治控制的有效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影响着政府和政治体系。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嵌入到政治系统并在民主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改善或抑制政治体系和体制的民主性,正如索瓦库尔(Sovacool)等从事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学者所强调的观点——人类的价值观和利益影响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同时,这些技术也影响着民主实践的或好或坏。^[13]

技术与民主的和谐共生取决于对技术的良好设计和规制。相关部门既要开发和部署新技术,又要保障相关决策的民主合法性。没有充分的设计和强有力的规则来构建和指导,民主最终的发展有可能事与愿违。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在社会中研究、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时所选择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制度的可信度和合法性的近期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可能干预是否足够合理和可控”。^[14]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民主制度本身核心的重要问题。正如布尔坎(Brkan)所言,“人工智能的使用既能威胁民主,也能保护民主”。^[15]作为权力合理化的工具,“技术是使现代民主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但它不是民主的天然盟友”,并且,“技术专家也不是民主的天然拥护者,甚至不是合格的顾问”。^[16]因此,将人工智能纳入民主进程,并加以合理的规制和设计,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种必要。

二、福与祸的迷思:两种不同的看法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数字时代的巩固已成事实。在民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宏大叙事中,人工智能的优势受到赞扬,其风险受到警告。技术乐观派和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加强民主,扩展民主理念与实践的边界,提升政务效率、增强政治透明度,改进民主的质量;而技术怀疑主义者和反乌托邦主义者,则对此持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如曼海姆(Manheim)认为“人工智能对民主本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工智能可以被‘武器化’,破坏选举,毒害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17]人工智能究竟是更新的机会还是颠覆性的力量?它对民主的运作意味着什么?理性的人工智能代理会作出更好的民主选择,进行更好的民主对话吗?鉴于人工智能的广泛采用和其日益增长的能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 政治参与:是提高政治参与度还是使政治参与更加不平等

民主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鼓励公民参与可以改善民主制度的运作。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指出,没有政治选择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民主。^[18]伯林(Berlin)和波普尔(Popper)对民主的概念作了特别的解释,他们都强调了公民参与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19]瓦伦蒂尼(Valentini)也指出:“一个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当且仅当其决定所适用的那些人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决策。”^[20]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创新了公民参与政治和作出决策的方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公民政治参与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基于投票和选举代表的模式,到基于公民参与和审议的模式,不一而足。事实上,人工智能被用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许多互动实例中,来促进公民参与,以优化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和效率,以及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开发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交机器人,以优化与市民的在线互动。

对于人工智能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的作用,一些学者纷纷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增强和深化民主参与”和“加强多样性和包容性参与”。^[21]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第一,促进民主商议。如图德拉指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促进民主商议”来“提高民主质量”。^[22]兰德摩尔(Landemore)也指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商议质量,从而帮助实现协商民主。^[23]还有学者提出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扮演推动者、翻译者、事实核查者、争论组织者、交流跟踪者、质量衡量者以及群体所处位置的可视化者的角色来帮助扩展和改进商议。^[24]第二,促进选举参与。选举是西方民主的基石。蒂姆(Tim)断言:部署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同伴效应来达到更高的公民参与度和选举参与率”。^[25]卡昂(Kahng)也指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和算法来实现电子民主和直接民主,或选择他人委托投票。^[26]并且,“人工智能了解每个人的偏好和观点,并为其提供相关信息,使他们成为治理的合格参与者”。^[27]第三,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基本要求。人工智能“促成了结构不同、更赋权和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的兴起”。^[28]萨瓦加(Savaget)认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这种公民技术和公共舞台,促进公民参与和合作,并加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29]而且,作为公民互动和交流的数字公共领域,有利于凸显公民共同的立场、关注点。^[30]

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对公民参与有重大的风险,它制造了新的参与不平等,并断言“将在振兴民主和民众参与方面自相矛盾”。^[31]其观点如下:第一,加剧数字鸿沟。如Skaržauskienė等人指出,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鸿沟,使那些本已难以行使权力的人进一步边缘化”。^[32]夏尔马(Sharma)也指出,“不公平的政治代表和决策,将某些群体排除在进程之外”,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33]第二,操纵算法。如曼海姆指出,利用算法技术的“引导”和操纵,“可以让某些人有效地管理大众,而无需让公民参与民主进程。阻碍政治参与是那些滥用人工智能来操纵和控制公民的人的目的之一”。^[34]斯塔克(Starke)也指出,“公民可能对智能算法用于决策的标准或数据缺乏洞察力或影响力。这可能会破坏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如公民参与或公民代表性”。^[35]第三,干预选举。如曼海姆指出,一些人通过操纵公众舆论和搜索引擎结果,从而压低选民投票率等方式来干预选举。他甚至指出“破坏民主参与,人工智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36]尤其是那种“以影响选民为目的的虚假通信篡改了民主,严重损害了民主参与”。^[37]布尔坎也指出:“欧洲和全球的自由选举和民主可能会因恶意使用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而受到不利影响。”^[38]因而,在选举方面,人工智能通常被这些人视为一种威胁。

(二)政治决策:是使决策更明智还是为技术官僚决策铺平道路

民主决策是一个潜在的复杂而混乱的过程,有时可以用著名的“垃圾桶”模式来描述,即一个企业内部的最终决策是由极少数人决定的,而众多员工所提的方案则被扔进垃圾桶。^[39]政治决策者有着大量的信息需求,同时追求作出与公民偏好相一致的决策,以赢得选举支持。“人工智能(AI)正逐渐进入政府和政治决策领域”,^[40]并且“与任何技术一样,人工智能也离不开政治决策实践”。^[41]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优于人类决策,尤其是在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高级战略推理和分析以解决复杂问题时。其中一个例子是,有人建议,基于强化学习和多层代理模拟的“人工智能经济学家”可以制定更好的税收政策,提高生产力水平,同时减少收入不平等。^[42]现实中,欧盟委员会很早就表达了对用于决策的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兴趣,认为“数据技术是决策者手头的宝贵工具之一,可为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信息,这个过程包括从发现问题到设计干预措施和监测结果”。^[43]

一些乐观派学者认为,由于卓越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供信息,而且还具有代替人类作出更明智的决策的能力,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辅助工具,是民主决策的拐杖”。^[44]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促进海量数据系统化和结构化。如威廉姆斯(Williamson)认为,机器学习可用于模拟政策行动,并不断从公民那里获取信息,然后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并帮助作出更多基于证据的决策。^[45]现实中,政治行为者通常需要大量信息来作出决策,人工智能被认为是生产相关知识的卓越工具。第二,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和包容性。如米兰(Milano)认为,通过优化决策过程、数据

和意见挖掘、博弈论和基于代理的模拟,人工智能还有助于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和包容性。“早期数据情报工作可以帮助公共决策者更快地发现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或公民关切的问题,从而作出更及时、更准确的政策回应”。^[46]第三,增强政策的实施和评估能力。赫克特尔(Höchtel)在对人工智能决策方面的潜力进行评估后认为,人工智能在信息吞吐量层面对政治决策者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加强产出层面反馈联系的能力,它能对政策选择进行持续监测和分析,政治行为者可以更快、更灵活地重新评估以前的决定,更好地将政策决策与公众偏好联系起来。^[47]

一些批评者认为,人工智能为技术官僚决策铺平道路,同时“给民主决策带来了风险,包括产生了有偏见的算法、不透明和复杂的系统、失控、责任不明确,以及日益严重的权力不对称”。^[48]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使决策过度依赖于技术和自动化程序。如柯尼希(König)指出:“过度依赖自动化决策系统,可能会削弱民主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决策的政治辩论。”^[49]卡纳(Khanna)也认为,高度的技术自动化将导致决策者与公民更加疏离,责任模糊化等。^[50]第二,加剧权力不对称。如柯尼希指出,人工智能可能被一些团体和组织用来获得对影响政治决策至关重要的信息优势,从而满足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负面情景的总体结果将是执政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对称加剧”。^[51]第三,忽视人性化需求。如科克尔伯格(Coeckelbergh)指出,过度依靠专家、专业知识和数据来作出政治决策,结果是“通过从公民手中夺走决定权,甚至操纵他们,没有认真对待人们想要自己决定个人生活、社区、社会等事务的态度”,导致政策缺乏温度和灵活性。^[52]第四,人工智能的技术官僚主义是基于低透明度和高度自动化系统的产物,“整个人工智能介入决策的过程缺乏透明度,可能被控制技术系统的人故意操纵”,^[53]而“人工智能‘黑匣子’决策的不透明性与民主自治和正当程序原则背道而驰”。^[54]

(三)信息供需:是增强政治信息导航还是制造新的信息障碍

民主与信息供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最低限度的民主理念中,信息需求已成为政治判断和选举选择的基础。例如,在信息的自由流动方面,拉斯韦尔(Lasswell)指出,“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产生影响”凸显了信息传播模式在社会控制和民主实践中的核心作用。^[55]在公民信息素养方面,公民获取、评估及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参与公共讨论,作出理性的政治判断,这对维持健康的民主至关重要。如费斯克(Fiske)所指出,信息素养是民主社会存续的基础。^[56]在媒体多元化与民主质量方面,防止信息垄断和维护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其重要保障。如哈贝马斯指出,健康的公共领域是民主对话的场所。^[57]作为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学者们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塑造信息环境,如何创建和提供政治信息,以及如何改变民主的信息基础并影响民主运作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在增强政治信息导航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优化了政治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方式,还深刻改变了其传播生态,塑造了信息环境。这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获取和处理信息。如丹尼亚诺维奇(Damnjanovic)指出:“人工智能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能力方面拥有足够的知识,甚至拥有将伤害最小化和将幸福最大化所需的智慧。”^[58]荣格尔(Jungherr)认为:“人工智能不仅影响信息获取,还影响数字通信环境中意见、利益和关注点的表达。”^[59]博埃拉(Boella)也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公众利用系统处理大量文本以综合有用信息。^[60]第二,传播和推送信息。如布尔坎指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可以实现可扩展性,这使它们能够大规模传播信息”。^[61]凯伦(Karen)指出,人工智能具有推送个性化信息的能力,能实现与个人倾向的最佳共鸣。^[62]第三,核查和防御虚假信息。杜贝里(Duberry)认为,人工智能是“防御虚假信息运动的手段”,也可以算作“过滤虚假新闻的主要解决方案”并且“减少其传播的潜在机会(即自动事实核查)”。^[63]荣格尔指出:“人工智能对内容进行分类的能力使其处于打击有害数字言论和错误信息的最前沿。”^[64]希尔伯特(Hilbert)

也提出,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筛选传递给我们的大量信息”。^[65]

尽管有人认可人工智能在信息的供给和吸纳方面具有促进民主的作用,但一些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这同样体现为几点:第一,收集、选择或解释信息的算法系统会加剧甚至制造新的信息障碍。如卡尔森(Carlson)认为,人工智能进行算法排序和过滤,主要是为了吸引用户,而非传达翔实的政治信息。^[66]又如戈顿(Gorton)等人认为,对政治信息进行高度个性化的定位可能会导致选民分散、政治响应性降低,以及公民与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减弱。^[67]还有人认为公民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限制在算法创建的过滤气泡之中。^[68]第二,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科克尔伯格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使事实得以歪曲,例如,通过改变搜索引擎或创建虚假视频(深度伪造)”,“或者通过社交媒体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有意和有针对性地传播错误信息”。^[69]荣格尔还担忧到:“未来的人工智能有可能被用来大规模地产生虚假信息”。^[70]第三,数据不当收集、分析和使用。杜贝里指出,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在“被出售、共享、交换、在线提供”的风险。^[71]曼海姆也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带来信息不对称、侵犯公众隐私、数据非法使用等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加剧而不是消除与流行观念相反的人类偏见。这给平等和民主带来了真正的风险”。^[72]

(四) 公共服务:是使服务更加公平高效还是不透明和缺乏自主

透明度、公平性和责任制都是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变革,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对传统服务方法进行创新,以实现符合这些核心要素要求的目标。各国政府正逐步采用一系列创新技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如:数字化公共行动并优化其运营和服务;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参与度。这就是电子政府概念所指的:利用技术实现“更高水平的政府履职效力和效率,改进流程和程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在决策过程中更好地利用信息,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更好地沟通”。^[73]人工智能是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的核心,政府越来越多地采用它来自动化分析大型数据集,以优化和支持现有流程和服务。然而,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不受监管,并且是一个模糊(概念上的挑战)、多变(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应用)、往往不透明(黑箱现象)的代理,这意味着将其运用于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处理中也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并准确评估政策选择的结果,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也体现为几点:第一,增强政治系统的产出。算法系统运用于政治背景下的成果最突出地体现在政治系统的产出方面。威廉姆森认为,利用算法治理的潜力制造产出是电子政务更大愿景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增强公共服务。^[74]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卓越的信息处理能力,更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完成人力难以完成的复杂指导与协调任务。^[75]第二,促进公平和透明。科利亚内斯(Coglianesse)认为,人工智能带来更加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有助于产生更加公平的结果。^[76]莱普里(Lepri)也认为,人工智能塑造公共部门的决策也有助于实现公平,因为它们是客观的,在运行时不会受到情感状态和人类决策中各种偏见的影响。^[77]另外,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则是透明。它“以开放、可访问和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政府数据,目标是使治理更加透明和负责任”。^[78]第三,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如杜贝里指出,“人工智能为政府提供了许多好处,可以提高其运行和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公民从更有效率和更有效果的公共行动中获益匪浅”。^[79]萨瓦加也指出,人工智能可以使民间社会与公职人员和政治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增强公民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80]

对于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批评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背离了民主的三个主要特征:透明度、问责制和公平性”。^[81]这些观点反映如下:第一,产出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制。一些文献指出,算法隐藏在黑箱中,因此很难对其建立问责制。由于机器学习具有动态和复杂的性

质,对其运行进行监控和审查非常困难。这给使用人工智能作出的决策在践行合法性、透明度和责任制原则方面提出了巨大挑战。^[82]第二,使公民丧失自主权和平等权。科克尔伯格指出,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操纵,这将违背人类的自由和自主。^[83]人工智能可以在公民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干预到他们的决策自主权。^[84]另外,大数据收集和使用中的伦理或方法上的缺陷可能会再现社会不平等。第三,存在算法偏见和歧视。算法系统和人工智能包含了某些假设和价值观,自动决策中表现出的偏见可能导致对受保护群体的系统性歧视。^[85]维茨(Wirtz)等人指出,如果数据中存在偏见,算法将复制甚至强化这种偏见。^[86]“历史数据尤其如此,这将导致算法以某些歧视现象普遍存在的历史时期为基础,从而最终强化这些歧视现象”。^[87]第四,在服务的质量上,人工智能只是帮助决策过程,经过其“简化”或“增强”商议,而无法提供人们从“真正的”或“全面的”商议中获得的学习成果。^[88]

三、监管与治理:未来的超越之道

在民主实践中使用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今的各国政府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们被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其政务流程的性能;另一方面,它们也被要求保护公民免受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影响。现在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人民统治的民主理念怎么与日新月异的算法决策系统相兼容?人工智能如何被赋权用于治理,作出更好的民主选择?因此,“为了实现人工智能的承诺并规避风险,我们需要管理这项技术”。^[89]在民主领域,就需要建立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到维护法治原则的治理体系,既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与包容性,又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以防范技术滥用,共同迈向一个既智能又民主的未来。

(一) 优化开发设计,将民主法治原则融入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的目标及设计必须将民主理论与技术工作联系起来,符合基本价值观,并能普遍促进人类福祉。“有意识的设计选择和透明的审核可以帮助改善功能障碍并发现偏见”,^[90]而“设计不佳的人工智能可能会进一步产生负反馈循环,加剧不平等”。^[91]维耶纳(Wiener)指出,“与技术决定论者所理解的相比,民主利用技术能力偶然性更大,更困难,更依赖于道德信念、政治参与和良好的设计选择”,^[92]并且,“技术的设计中蕴含着价值观和政治倾向”。^[93]乔伊斯(Joyce)也认为:“人工智能设计嵌入到权力关系中,再现了政治塑造的思想和世界观。”^[94]因此,人工智能从开发之初就应将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原则融入其中,确保包括自动决策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类型流程都按照责任、透明、可解释、尊重人的尊严和有意义的控制等原则运行。这些价值观、法治、民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在先进软件和网络物理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设计和保护。欧洲人工智能特设委员会指出,“在开发、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时应充分符合尊重人权、民主运作和法治的原则”,“引入有关稳健性、安全和网络安全、透明度、可解释性、可审计性、不歧视和问责制的规定”。^[95]杜贝里也指出:“要将平等、自由、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设计’整合到技术之中。”^[96]

设计正义^[97]提供了有用的视角来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延续的治理模式。由于人工智能有可能破坏或侵蚀公民自由、平等和参与等公共民主价值观,因此这就要求确立某些基本原则和规范,指导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设计和应用,并以一致和审慎的方式规范所有类型的组织,“包括公共和私人行为者,能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开发、设计和应用可能对人权、民主运作和法治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98]作为监管的主体的管理者应按照平等、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原則,针对特定个人或群体进行设计和提供服务,防止垄断集中和滥用权力,成为风险制造者。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设计者的工程师们,则要求“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在伦理上与民主价值观保持一致,这样他们就会把公民的最

佳利益放在心上”。^[99]杜贝里也指出,“在任何公民创新和公民技术中,交互设计对于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至关重要。必须非常谨慎地考虑。特别是必须认真考虑技术的选择和这种技术所允许的功能,以避免加剧现有的歧视,例如数字鸿沟。”另外,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上,“以人为本的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确实势在必行”。^[100]即将人置于数字战略和政策的中心,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民主的现代化,而不削弱民主的质量。

(二)完善法律规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

良好的法律监管框架对于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至关重要。人工智能进入社会后会在法律、道德层面产生充分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技术之中融入现有的治理结构、公共政策和法律。人类生活的世界至少是由技术、法律与民主共同塑造的。迄今为止,任何技术都是在法律的塑造下生存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则约束,人工智能就不能也不会为公共利益服务。任何强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技术,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都不可能不受制于“民主法治规则”的约束。“当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变得无处不在时,如果不对这些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进行法律监管,实际上就等于民主的终结”。^[101]另外,与道德和自我监管相比,法律的核心优势是具有民主合法性,甚至可以强制执行。再者,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套切合实际的规则和监管机构,来维护民主体制和价值观。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和监管机构对其实施的监督水平。通过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这些技术进步有望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企业、监管机构和社会需要明确地说明希望使用人工智能实现哪些经济、政治或社会目标,以及其具体工作方式如何推动或抑制这一追求。

当前,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已迫在眉睫。自主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及其广泛的使用很可能产生比不受监管的互联网更大的灾难性影响。因此,“仅从互联网的经验和人工智能的潜在能力及其潜在的广泛使用来看,就有充分的理由支持预防性法律框架,制定必要的基本规则,以维护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的公共利益”。^[102]法律对技术进行监管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已经开发了大量的法律和政策工具,以解决早期人工智能应用在公民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定义为“围绕处理数据的算法制定规则”。^[103]强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已经证明,若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管,它们可能不会主动追求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2018年以来,人工智能需要受到法律监管一直是世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主张。欧美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部法规。2018年5月,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2024年8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正式生效。2022年10月,美国也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我国目前尚未通过一个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法规。因此,我国在法律层面建立最低标准的尝试已经迫在眉睫,应加快出台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确保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遵循人类共同价值观,明确安全责任和问责机制,保护公民隐私和人权,提高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和效率。

(三)加强道德约束,制定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

人工制品与其使用具有道德相关性,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去设计和使用。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演进,引发了人们关于其对社会和社会伦理的影响的迫切担忧问题。因此,“采用伦理价值观来完善人工智能的监管框架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104]在人工智能的监管中,虽然道德伦理规则不能取代法律,但关于制定技术伦理规则的工作可以成为制定法律的先驱,它们可以为拟定法律规则的可能内容提供方向。正如埃尔曼(Erman)所指出的,“虽然新法律法规的起草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治理的新阶段,但道德准则这种软法律方法可以说仍然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部署的重要治理机制”。^[105]事实上,当今无论是在软性法律和政策工具方面,还是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法律方面,公

共部门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准则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伦理准则往往侧重于与民主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和原则,因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主要规范性问题之一就是对其发展和应用缺乏民主控制。

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主要由自愿性道德规范和准则组成。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世界上不仅已经明确了人工智能对法治、民主和个人权利构成的诸多重大挑战,还促使私营和公共部门以及开发者在人工智能自主系统中制定了大量的指导性道德框架。例如,菲尔德(Fjeld)等人汇总了世界各地制定的这些人工智能道德规范,并在这些文件中列举了八项主要的交叉的道德准则:隐私、问责、安全保障、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公平和非歧视、人类对技术的控制、专业责任、弘扬人类基本价值观等。^[106]此外,欧洲科学伦理和新技术小组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及“自主”系统的声明》(*Statemen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民主先决条件。这些政策文件指出人工智能在伦理上应该是合法的、合乎道德的。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哪些挑战可以安全地留给道德来处理,以及哪些挑战需要通过可执行的并基于民主程序的规则来应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考虑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因为那种“相信我”式的企业自律即使取得成功,也有很大的实践局限性。因此,我们既要建立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明确其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以规避负面影响和伦理风险,同时也要认识到“任何通过道德来取代或规避人工智能必要法律的努力都必须被拒绝”。^[107]

(四)推动国际合作,构建共识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民主的全球性威胁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协作,制定国际协议和标准,加强监管框架建设,保护公民权利,确保技术道德和对人工智能负责任的使用,促进技术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维护全球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信息垄断和侵犯隐私等民主威胁问题,各国国内的政策和方法可能无法为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提供有效指导,因此需要通过各国的合作来制定全球治理政策。“全球治理”一词通常意味着将多个行为者、代理人和机构纳入全球集体行动的协调中。全球治理的总体目标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避免全球公共利益受损。许多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得到人工智能系统越来越多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是指政府、国际和政府间组织、非国家和私人行为者为规范这些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而制定规则、流程和决策程序。然而现实是:目前在该领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监管框架,这对保护公民的隐私和安全以及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了严重影响。^[108]因此,必须通过能吸引更多国家广泛参与的合作治理制度,建立国际准则和标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民主化,让全世界共享民主治理经验,共同努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的民主理想和共同利益。

然而,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战略和政策,要组织具有不同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的国家制定国际框架来规范人工智能的使用,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另外,在理想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应该是民主和公平的,但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人工智能的扩张可能带来新的地缘政治问题,如各国竞相争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导权。欧盟、美国和中国政府都已将人工智能视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战略领域,这也导致各国纷纷制定各种政策来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嵌入在塑造技术制度的政治动态、冲突和争端中。全球各国对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竞争体现了权力和影响力在国际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也引发了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担忧,促使各国和国际组织通过创建不同的论坛寻求共同应对之策。如二十国集团(G20)创建了一个全球论坛,就地缘政治风险展开讨论,并制定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共同政策。经合组织创建了一个人工智能政策观察站,寻求建立可靠的技术机制。联合国在其文件中也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相互依存性,讨论了监管等问

题。尽管世界各国尚未通过一个统一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但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监督上,已经作出了重大尝试。对于我国而言,应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伦理准则和法律的制定,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方案。

四、结 语

在数字革命的时代,人工智能被用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许多互动实例中。当人工智能帮助公民获取信息、促进公民协商以及帮助他们自由参与政策决策和投票时,它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不仅与使用这些技术的理由相矛盾,而且与民主的政治想象相矛盾,对民主的基本框架构成了根本性挑战。但应看到,“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有助于改善民主制度,相对于目前而言,有助于弥合当前的民主差距;相反,如果它带来的风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它可能会严重侵蚀民主”。^[109]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群科学家和利益相关者警告说,技术决定主义不应取代民主,必须重新确认民主的首要地位,必须通过反制机构重新赋予公民权力。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面对日益占主导地位的人工智能平台和不完善的治理结构,民主将面临动摇的风险。^[110]总之,对人工智能工具越来越多的使用将给民主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也伴随着相当大的风险。为此,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合适的监管框架,确保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与民主兼容,用“数据造福人类”。

注释:

- [1] J. David Bol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edalus* Vol. 113, No. 3, 1984, pp. 1 – 18.
- [2][59][64][70][90] Andreas Jungher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Vol. 9, No. 3, 2023, pp. 1 – 14.
- [3][37][104] Konstantinos Kouroupis, “AI and Politics: Ensuring or Threatening Democracy?”, *Juridical Tribune*, Vol. 13, No. 4, 2024, pp. 575 – 587.
- [4][8][24][44][53] Mark Coeckelbergh and Henrik Skaug Sætra,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itical Pathways of AI: The Technocracy – democracy Dilemma in L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Agency”,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75, No. 1, 2023, pp. 1 – 7.
- [5] Mohd Azizuddin and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Vol. 32, No. 2, 2014, pp. 123 – 147.
- [6][93]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Vol. 109, No. 1, 1980, pp. 26 – 38.
- [7][14][22][109] José Tudela Aranda, “Gobierno, Parlamento, Democracia 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Teoría y Realidad Constitucional*, No. 52, 2023, pp. 303 – 333.
- [9] Bruno Latour et al.,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0][11][16][27][28] Mathias Ris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Democracy”, in Silja Voenecky et al.,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99 – 118.
- [12] Stephen Coleman, *Can the Internet Strengthen Democrac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17, p. 27.
- [13] Sovacool, B. K. and Hess, D. J., “Sociotechnical Agendas: Reviewing Future Directions for Energy and Climate Research”,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Vol. 70, 2020, pp. 1 – 35.
- [15][38][61] Maja Brk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mocracy: The Impact of Disinformation, Social Bots and Political Targeting”, *Delphi –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Vol. 2, No. 2, 2019, pp. 66 – 71.
- [17][34][36][54][72] Karl Manheim and Lyric Kapl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s to Privacy and Democrac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 21, No. 1, 2019, pp. 106 – 188.
- [18] Alain Touraine and D. Macey, *What is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 [19] Berlin, I.,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opper, K. R., “The Propensity Interpretation of Probabilit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0, No. 37, 1959, pp. 25 – 42.
- [20] Valentini, L., “No Global Demos, No Global Democracy? A Systematization and Critiqu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4, pp. 789 – 807.

[21] Gilman, H. R. , “Civic Tech for Urb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50, No. 3, 2017, pp. 744 – 750.

[23] H. Landemore, “Can AI Br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o the Masses?” , 2023, <https://www.law.nyu.edu/sites/default/files/Helen%20Landemore%20Can%20AI%20bring%20deliberative%20democracy%20to%20the%20masses.pdf>.

[25] Hwang, T. and Nanis M. , “Socialbots:Voices from the Fronts” , *Interactions* Vol. 19, No. 2, 2012, pp. 38 – 45.

[26] Anson Kahng et al. , “Liquid Democracy:An Algorithmic Perspective” ,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Vol. 70, 2021, pp. 1223 – 1252.

[29][49][51] Pascal D. König and Georg Wenzelburger, “Opportunity for Renewal or Disruptive Forc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ters Democratic Politics” ,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 37, No. 3, 2020, pp. 1 – 11.

[30] Thorsten Thi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ow It Impacts Democracy” , 2022, <https://us.boell.org/en/2022/01/06/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democracy>.

[31] Henrik Skaug Sætra, “A Shallow Defence of a Technocrac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xamining the Political Harms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the Domain of Government” ,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62, 2020, pp. 1 – 10.

[32][78] Skaržauskienė, A. and Mačiulienė, M. , “Mapping International Civic Technologies Platforms” , *Informatics*, Vol. 7, No. 4, 2020, pp. 1 – 13.

[33] Manisha Sharma,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o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 *Journal of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2, No. 1, 2024, pp. 96 – 100.

[35] Starke, C.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olitical Decision –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Effects on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Input, Throughput, and Output Legitimacy” , *Data and Policy*, Vol. 2, 2020, pp. 2632 – 3249.

[39] Cohen, M. D. et al. ,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17, No. 1, 1972, pp. 1 – 25.

[40] Pascald L D. KÖNIG, “Citizen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and Support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62, No. 4, 2023, pp. 1280 – 1300.

[41][48][81] Merel Noorman and Tsjalling Swierstra, “Democratizing AI from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 *Minds and Machines*, Vol. 33, No. 1, 2023, pp. 563 – 586.

[42] S. Zheng, A. et al. , “The AI Economist:Improving E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with AI – Driven Tax Policies” , 2020, arXiv preprint arXiv:2004.13332.

[43] European Commission , *Data4Policy*, <https://www.data4policy.eu/>, Accessed 24 March 2022.

[45][74] Williamson, B. , “Knowing Public Services:Cross – sector Intermediaries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Public Sector Reform” ,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29, No. 4, 2014, pp. 292 – 312.

[46] Milano, M. et al. , “Sustainable Policy Making: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Magazine*, Vol. 35, No. 3, 2014, pp. 22 – 35.

[47] Höchtl, J. et al. , “Big Data in the Policy Cycle: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the Digital Era” ,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Vol. 26, No. 1 – 2, 2016, pp. 147 – 169.

[50] Khanna, P. , *Technocracy in America:Rise of the Info – State*, North Charleston, SC:CreateSpace, 2017.

[52][69] Mark Coeckelbergh, “Democracy, Epistemic Agency, and AI:Political Epistemology in Tim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and Ethics*, Vol. 3, No. 4, 2023, pp. 1341 – 1350.

[55] Lasswell, H. ,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 in L. Bryson (ed.) ,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p. 37 – 51.

[56] Fiske, J.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Routledge, 1990.

[57]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IT Press, 1989.

[58] Ivana Damnjanovic, “Polity Without Poli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ersus Democracy:Lessons From Neal Asher’s Polity Universe” ,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 35, No. 3 – 4, 2015, pp. 76 – 83.

[60] Boella, G. et al. , “Eunomos, a Legal Docu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Web to Provide Relevant, Reliable and up – to – date Information on the Law”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Vol. 24, No. 3, 2016, pp. 245 – 283.

[62] Karen Yeung, “Algorithmic Regulation:A Critical Interrogation:Algorithmic Regulation” ,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Vol. 12, No. 4, 2018, pp. 505 – 523.

[63][71][73][79][87][96][100] Jérôme Duberry, “AI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s” ,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mocracy*, Cheltenham:Edward Elgar, 2022, pp. 14 – 39.

- [65] Hilbert, M. , “How much Information is ther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 , *Significance*, Vol. 9, No. 4, 2012, pp. 8 – 12.
- [66] Carlson, M. ,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 *New Media and Society*, Vol. 20, No. 5, 2018, pp. 1755 – 1772.
- [67] Gorton, W. A. , “Manipulating Citizens: How Political Campaigns’ Use of 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 Harms Democracy” ,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1, 2016, pp. 61 – 80.
- [68] Pariser, E. ,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2011.
- [75] Chen, Y. – C. and Hsieh, T. – C. , “Big Data for Digital Governmen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Vol. 1, No. 1, 2014, pp. 1 – 14.
- [76] Coglianese, C. and Lehr, D. , *Transparency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8.
- [77] Lepri, B. et al. , “Fair,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Algorithmic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es: The Premise, the Proposed Solutions, and the Open Challenges” ,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 31, No. 4, 2018, pp. 611 – 627.
- [80] Savaget, P. et al. , “Empower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 46, No. 3, 2019, pp. 369 – 380.
- [82] Annoni, A. and Benczur, P.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uropean Perspective*,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
- [83][88][89] M. Coeckelbergh, “AI for Climate: Freedom, Justice, and other Eth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 *AI and Ethics*, Vol. 1, No. 1, 2021, pp. 67 – 72.
- [84] Lanzing, M. , “ ‘Strongly Recommended’ Revisiting Decisional Privacy to Judge Hyper nudging in Self – tracking Technologies” ,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 32, No. 4, 2018, pp. 549 – 568.
- [85] Bartolini, S. , “Collusion,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 Part I” ,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1, No. 4, 1999, pp. 435 – 470.
- [86] Wirtz, B. W. et al.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ublic Sector—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42, No. 7, 2019, pp. 596 – 615.
- [91] Alexander Buhmann and Christian Fieseler, “Deep Learning Meets Deep Democracy: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Vol. 33, No. 1, 2023, pp. 1 – 34.
- [92] Norbert Wiener, *God & Golem, Inc. : A Comment on Certain Points Where Cybernetics Impinges on Relig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 p. 69.
- [94] Joyce, K. et al. , “Toward a Soci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Call for Research on Inequalit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Vol. 7, No. 4, 2021, pp. 1 – 11.
- [95][97] Ad hoc Committe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AHAI (2021) 09rev, 2021, <https://rm.coe.int/cahai-2021-09rev-elements/1680a6d90d>.
- [98] Costanza – Chock, S. , *Design Justice: Community – Led Practices to Build the Worlds We Ne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20.
- [99] Powers, T. and J. Ganascia, “The Ethics of the Ethics of AI: Mapping the Field” , in M. Dubber, F. Pasquale and Sunit Das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s of A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01][103] Nemitz, Paul,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ust 18, 2018) , DOI 10.1098/RSTA.2018.0089 – Royal Societ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A.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234336>.
- [102][10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telligent Politic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 2021, <https://www.coe.int/en/web/commissioner/-/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lligent-politic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media-and-democracy>.
- [105] Eva Erman and Markus Furenda,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me Normative Concerns” , *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Vol. 9, No. 2, 2022, pp. 267 – 291.
- [106] Fjeld, J. et al. , “Princip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pping Consensus in Ethical and Rights – based Approaches to Principles for AI” , 2020, The 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Research Publication Series, <https://cyber.harvard.edu/publication/2020/principled-ai>.
- [108] Konstantinos Kouroupis and Igor Serotila, *Privacy and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European Digital Agenda*, Athens: Nomiki Bibliothiki, 2022, pp. 97 – 128.
- [110] “A Manifesto in Defense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https://www.aiathens.org/manifeto>.

[责任编辑:刘毅]